



中国文化论坛

苏力 陈春声 主编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三十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第三十卷 第三期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三十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三十年

陈力 陈春声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苏力,陈春声主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8

(中国文化论坛)

ISBN 978-7-108-03226-3

I. 中… II. ①苏…②陈… III. ①人文科学—研究—概
况—中国②社会科学—研究—概况—中国 IV. C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5431 号

责任编辑 张志军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42.5

字 数 588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总 序

进入 21 世纪，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文明对于这个时代的人类历史能够做出怎样的贡献？这些问题萦绕在许多关心中国与世界文化命运的人的心头。正是出于对于当代中国现实和文化处境的关怀，由周凯旋、董秀玉两位女士发起，我们于 2004 年成立了中国文化论坛，由周凯旋女士与董秀玉女士任论坛理事会理事长，陈来、陈春声、甘阳、黄平、刘小枫、童世骏、王晓明、王绍光、汪晖、余永定、苏力任理事会理事。著名学者杜维明、金耀基、李泽厚、王元化、韦钰、许倬云、杨振宁等先生应邀担任论坛顾问。

论坛经过反复讨论确立了中国文化论坛的基本宗旨，即立足于 21 世纪中国文明的历史处境，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我们也可以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这一命题来界定所谓“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这个“自觉”并不仅仅是对某种抽象的文化原则的认同，它毋宁产生于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产生于对当代世界的历史形势及其未来趋势的全面把握。因此“文化自觉”这一命题中的“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和其他领域的方方面面；这一命题中的“自觉”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对于中国的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而这一关切和思

考不可能不涉及中国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寻求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等领域的独特的变革道路这一现实问题。

我们强调中国的变革有着自身的“独特的道路”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第一，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又经历了现代的革命和30年的改革，中国的变革必然是一个立足于自身的传统和现实而展开变革与创新的过程，那种简单照搬现成模式的方式不仅在历史中曾经导致灾难，而且也会在现实中将中国的变革引向歧途；第二，当代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的逻辑和同质化的趋势，中国的变革一方面离不开向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的学习和借鉴，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开放性中确立自身的自主性。所谓“和而不同”，表达的正是这种开放性与自主性、关联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将近一百年前，年轻的鲁迅这样写道：“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一百多年来，在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 and 实践中反复回旋的不正是这一持久的关怀吗？事实上，只有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人们才能避免盲目的自卑与自大，真实地理解我们置身的这个多样性的世界及其面临的挑战。

论坛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每年就某一具体问题举行一次或两次年度论坛和多次小型讨论会。理事会将根据具体主题确定负责该年度论坛组织工作的主席人选，并协助他做好论坛的各项准备工作；每届论坛的主题由理事会和顾问们在广泛征求意见并深入讨论的基础上确定。论坛将根据不同的主题，邀请知识界的同道，展开深入的、跨学科的讨论，力求突出思想文化的内涵，提出前瞻性的问题，并在每届年度论坛结束后编辑出版相关主题的论文集和其他出版物。

目 录

导言 80 学人与 30 年人文社科发展	苏 力 I
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	陈春声 26
 第一场 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思想创造的困境（一）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由来	姚 洋 39
经济学中的方法论	余永定 80
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经济学？ ——兼谈中国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	卢周来 95
问题与评论（一）	115
 第二场 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思想创造的困境（二）	
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	冯 象 133
法学职业知识和社会科学 ——侧重当代中国三十年	刘 星 143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1978—2007）：一个 引证研究	凌 斌 152
法律经济学在中国	赵晓力 188
问题与评论（二）	214
 第三场 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思想创造的困境（三）	
中美两国可以避免战略摊牌	陶文钊 225

关于三十年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	
——一项批评性和建设性兼具的讨论	时殷弘 244
30 年, 60 年: 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	
继承与发展	周建明 黄 平 255
问题与评论 (三)	284

第四场 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思想创造的困境 (四)

“接轨”还是“拿来”: 政治学本土化的	
思考	王绍光 299
中国模式	潘 维 328
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重建: “双向运动”的	
视角	马 骏 332
问题与评论 (四)	371

第五场 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思想创造的困境 (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	
——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解读	周晓虹 383
再论“中间圈”	
——“藏彝走廊”的论述与“社会”科学的	
再构思说明	王铭铭 404
失衡螺旋与国际形象	赵心树 407
问题与评论 (五)	412

第六场 人文学科与时代精神的演变 (一)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	
——几点不系统的反思	罗志田 423
谁在中国发现什么历史?	
——中西史学界的对话与自说自话	程美宝 451
纠葛于若干对立概念之间的中国历史学	杨念群 460

问题与评论（六）	475
第七场 人文学科与时代精神的演变（二）	
远去的文学时代（提纲）	黄子平 489
市场社会的样板人	
——近三十年大众文化推出的人格类型	黄纪苏 491
坐标·雾障与文化研究	戴锦华 506
问题与评论（七）	526
第八场 人文学科与时代精神的演变（三）	
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的回顾（1978—2007）	
	陈 来 537
“理论”的实践意义	
——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发展的	
两点反思	童世骏 549
从社会的热潮到深层的问题	
——西方哲学研究三十年来的反思	孙向晨 563
问题与评论（八）	575
第九场 教学与研究体制的影响	
留学运动三十年后（提纲）	甘 阳 587
从教育学到教育科学	杨东平 590
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知识的生产与流通	许纪霖 602
文教改革三十年：何去何从	刘小枫 614
问题与评论（九）	623
第十场 圆桌讨论 学术传承与世代更替	
学术世代交替是大道自然的过程	
——中国文化论坛 2008 年会总结陈词	陈春声 637
问题与评论（十）	645

导言 80 学人与 30 年人文社科发展

苏 力^{〔1〕}

若是以 1977 年恢复高考起算，并且有理由如此起算，^{〔2〕}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的恢复和发展已经 30 年了。30 年来中国人文社科发展的参与者，除了部分 50—60 年代的学人外，主要力量其实是这批 70 年代末进入高校并于 80 年代前期进入学界（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人。有鉴于此并为了便利，我将在本文中简称这批人为 80 学人。由于时代原因，这批学人年龄并不齐整，最年长的已 60 上下，最年轻的还不到 50 岁。在过去 30 年间，这批人在人文社科的各个学科领域内，不仅是其中最生动的力量，起到了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角色，而且许多人已成为各自学科的中坚——甚至已达 15 年之久。因此，这批人无论如何都应当对过去 30 年人文社科的发展

〔1〕 本届论坛执行主席，中国文化论坛理事。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院长。著作有《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阅读秩序》、《送法下乡》、《法律与文学》等。

〔2〕 一般认为，中国当代学术的恢复发展的标志是 1978 年底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从社会氛围和心态的层面来看，我认为最直观的标志应当是 1977 年的恢复高考。这一制度不仅对于学术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确定了整个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知识氛围，改善并大大提升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在文、史、哲以及经济和社会学等学科维系了近代以来的学术传统，在法学和政治学开始了重建学科的基本建设；它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高考制度在新中国以来第一次从原则上不再关注一个人的身份（家庭成分），而是强调公平竞争，择优录取，这实际体现了一个公民权利的概念，体现了法律（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政治、法治原则；这一事件还为 1978 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为后来的逐步发展的各方面的制度奠定了基础。

承担主要责任。这批学人在下 10—15 年间仍可能继续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由于人文社科学术人才和影响力发生的相对滞后^{〔1〕}以及中国人迷信的“姜还是老的辣”，不论这批人还有无学术潜力，或有，又能有多大的实际表现，其影响力都还可能继续上升，并通过他们的学生对中国未来更长期的人文社科学术的研究产生影响。因此，为了未来，而对过去 30 年中国人文社科予以总体考察，就必须对这一代人做一些宏观的并且主要是批评性的考察。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找问题”。

我坚持从中国社会和历史语境来分析这些问题的发生，但坚持“求人不如求己”的思路，我会更侧重分析这一代人自身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有很多是历史构成的，源自社会。这样处理，不仅因为“修身齐家”的传统思路，或是我接受毛泽东的命题，“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2〕}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就中国未来人文社科发展而言，反省自身并做出努力，比“怨天尤人”，是我们更可能自己把握的。学术的命运最终依赖于社会条件，但我们最能直接控制的，仍然是个体的努力。这样处理，还因为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的话说得“狠”一点，结论“政治不正确”或太伤自尊心，首先针对的是我自己，也不至于引发太多联想甚或诛心之论；我希望通过这种苛刻的分析讨论引发学界同仁的思考。

在一定意义上，本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未有设计的参与性观察的研究。但由于并非附着于某一个具体的学者或具体的经验，而更多的是关于作为群体的 80 学人，是关于这代人的一般概括，因此，这也可以算是一个现象学的研究，描述经验自身在清醒心智中的表现。这种描述和分析必定是有限的，注定不可能正确和全面。只是，与

〔1〕 关于这一点，有关的研究，可参看，波斯纳：《衰老与老龄》，周云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卷 1，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 版，第 302 页。

我之前的研究一致，^{〔1〕}我希望在文献综述或人物研究或制度演变的传统研究方式之外，寻求一种新的关于学科发展的研究进路，作为补充，而不是作为替代。

一 80 学人的成就

如果纵向比较，同 1949—1978 年的 30 年比较，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的人文社科的发展，可以说，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而作为 30 年发展中的主力，80 学人应当说是足以骄傲和自豪的。更年轻的两代学人（如果按 10 年一代算），即使看到了 80 学人的弱点，总体上还是给予了 80 学人很高的，甚至我要说过高的评价。由于他们上学前以及毕业后的那种几乎不大可能、也不应为后代学人重复并因此有点传奇性的经历已经有点被神话了。在法学界，由于历史断裂，77—78 级往往在一些媒体上也被戏称为“黄埔一期”。^{〔2〕}许多人感觉良好，似乎也有理由感觉良好：他们出版的论文、著作和教材，无论就数量还是就质量而言，一般来说，已经超过他们的师长辈，有些甚至是远远超出（尤其是在那些之前很少研究的领域，例如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等），^{〔3〕}尽管是否超出了更早的一代学人，还有争议；^{〔4〕}他们中的一些顶尖人物在学界的地位至少已经持续了 10 年，甚至将近 20 年了，有些还是一些领域的重新开创者或新领域的开创者。所有的世俗标准都显示，80 学人成就卓越。乃至有记者撰

〔1〕 苏力：“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社会学研究》，2003 年 2 期。

〔2〕 “西南政法大学：风雨五十年”，《南方周末》，2003 年 11 月 27 日。

〔3〕 相关的数据，可参看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特别是第 1—3 章。

〔4〕 可参看，冯象：“法学方法与法治的困境”，《木腿正义》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30—133 页。相反的观点，请看许章润：“书生事业 无限江山——关于近世中国五代法学家及其志业的一个学术史研究”，《清华法学》卷 4，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文赞美法学界，题目是“78级神话”。〔1〕

但也只是个神话。因为即使在学术传统之内，仅仅同前人相比是不够的；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与转型和知识转型，还有建国和“文革”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必须寻求其他的标准。

我认为至少可以提出三个标准。一是横向比，即同我们欲求与之接轨的发达国家的人文社科学术比。尽管有些学科很难比，特别是人文。但至少就一些可比性较强的学科而言，例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学术发展水平，差距是显然的。我无法以翔实的数据和分析来证明这一点。但有大量的替代证据，这就是大量的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畅销，以及学者和学生大量引证国外学者的作品。〔2〕事实上，80学人比较优秀的著作，也无不或多或少借助了外国学术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思路和方法上，尽管不应由此贬低了这些作品的价值。尽管确有某种“外国月亮”或“远来和尚”效应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假定，在有竞争的情况下，消费者不可能长期被供应商糊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些标志都表明在学术消费者眼中，中国学者的学术是有一定甚至是相当差距的。当然，这个差距显然被市场夸大了，毕竟，翻译作品大多因其至少比较好才获得译者和出版社的青睐。

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第二个标准，中国社会需求的标准——中国人文社科学人还没有为中国消费者提供足够优秀的学术著作，乃至，在许多时候，许多学科还不得不进口一些甚至大量学术产品来满足社会需求，即使在文史哲这样一些人文领域，也无法避免，想想西方汉学研究著作在当代中国文学界的重大影响。〔3〕如果不

〔1〕 “78级神话：法学教育难以复制的辉煌”，《检察日报》，2007年5月18日。

〔2〕 可参看凌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1978—2007）：一个引证研究”，《中国文化论坛》2008年年会论文。关于法学，则可参看上注3，第1章。

〔3〕 例如，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等等。

怕丢脸的话，事实上，也并不丢脸，我自己以及不少 80 学人都曾当过或还在当着学术进口商或更难听一点“二道贩子”。当然，可以说，学术不分国界，但问题是我们的学术出口尽管在增加，却还是太少了。人文学科还没有或无望在短期内出现钱锺书、陈寅恪这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尽管应当承认人文学术的滞后效应。不仅中国人文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在国际上是边缘的；甚至在国内，也是于丹等在民间有更大的影响力。在社会科学上，也许只有经济学研究获得了某些国际学术认可；其他学科尽管对国际学术状况了解多了，该介绍的人物、学派也大都基本介绍了，但很少有重大学术影响的中国学人的著作；应当说著作出版的也不少，获奖也不少，但其中一些往往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显然脱节太大，无助于回答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更多的是，即使观点不错，实际效果也不错，但根本无法实现学术的论述。就整体而言，在国际上，中国学者主要还是靠“中国”这两个字吃饭，只有少数人能够靠“学术”这两个字吃饭。就总体而言，没有多少学者的成果获得了国际上较高等度的认可。

当然，由于中国的个头大，问题多，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即使一些不太成熟的成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上述特点本身也可能为这类研究和学术建制提供正当性基础，由此可以预期更具一般性的智识贡献，但至少目前总体而言，还没有明显的迹象。我不知道我的直觉是否普遍适用，但至少法学界如此。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显然无法与过去 30 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相媲美；人文社科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远不如中国经济、政治实践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或大国崛起所需要的思想学术文化的软实力还差距巨大。

第三个标准是基于个人自省而建立的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标准，一种基于反事实构建起来的标准；即如果完全不考虑社会的其他变量，80 学人能否做得更好一点，是否做到了自己的最好。我认为没有。诸多社会的、历史的和社会变迁的因素，都使得 80 学人没有在学术贡献层面做到他们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天真地立志做到的——“把四人帮损失的时间抢回来”；或即使有这些因素，他们

也没有做到他们本可以做到的那么好。而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苛刻地归咎于 80 学人的个人的努力、才华、坚持、远见以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或多或少已经失落的历史使命感或社会责任感。

正是基于这三个标准，我对这 30 年的学术成就有所保留；自然也对我们这一代人自身有点怀疑。至于中国学术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则太多了：太多的学术成果既不太学术，也难说成果；学术风气不良，学术很不规范；很多学术体制（例如重点学科、博士点设置、重点研究基地、核心刊物等）都没起到足够的学术引领作用，有的带来了副作用，甚至变成了少数人寻租的工具；某些人文学科相对边缘化或弱化，缺少真正有影响力的成果，缺少真正有知识贡献的学者；太多地关注外国，对本国的关注仍然很不够，缺乏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感，缺乏大气。就总体而言，我的基本判断是，这一代学人基本上是在恢复学术传统，有一些，但缺乏重要的创造，甚至，由于时代的种种局限，目前已经很缺乏创造的动力。

二 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

这既是现实，也是问题；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凝固在 80 学人身上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尽管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也可以说是“文革”10 年积累的潜在人才，但历史地看，80 学人还是有颇多先天不足的，尽管有其优点。

首先是，大学前教育不足。大部分 80 学人，无论是“老三届”还是应届，他们的大学前教育都是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完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没有经过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中学教育，基础知识相对也许不能说薄弱，但不完整几乎是肯定的。至少用今天的大学考生标准来看，他们的外语能力普遍偏弱，甚至很弱。尽管经历使得他们往往有比较强的自学能力，甚至有比今天的大学生更强的智识偏好，但毕竟当时可获得的阅读资源非常有

限，以及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想氛围，尽管有某种程度的自由选择，选项则受到极大的限制。一般说来，他们可能接触的普遍偏重古典人文，无论中外；他们极少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和初步训练。没有老师指导，没有其他辅助的社会筛选机制，他们靠自己培养起了与自己年龄相适应的学术眼光和批判眼光，但也因为没有导师，他们有可能过早地在学习上路径依赖，难以更深体会那些可能需要某些指导的经典。

其次是，大学教育也有欠缺，特别是在一些相对新兴或有重大知识转型的社科学科。尽管中国在政治上 1978 年就启动了改革开放，但转变不可能一日间完成；在包括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这个过程至今仍随着社会发展而继续。受制于刚刚起步的改革时的政治社会学术文化环境，受制于师资、文献和资料的严重不足，教材陈旧且欠缺，也受制于那个时代的老师的学术禁忌、方式、习惯和水准，80 学人受到的尽管是当时最好的大学教育和训练，今天看来却仍然严重不足。人文学科可能还好一点，还有些传统；社科大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例如，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社会学学者，大都是从大学本科其他专业的毕业生转过去的，尽管后来补了许多课，但欠缺从一开始就是显然的。在法学学科中，当时几乎没有教材，几乎没有学术著作，很少外国译著；甚至什么是学术论文，什么是文献回顾，什么是学术随笔，什么是学术专著，什么是著作，很长时间在学界也没有严格区分。这个问题与 80 学人的老师也有关系，尽管他们当中有不少优秀的、有见识的学者，但由于种种原因，绝大多数教师基本没有受过除资料和文字训练之外的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其中一些还基本是同 80 学人一起开始学术训练和学术生涯的；当时的大学也普遍以教学为主，发表和出版渠道非常有限，我们老师辈中有许多人没有撰写过多少甚或就没有写过严格的论文，没有撰写过严格意义的学术专著。许多导师对学生的评价也只是看重学生的才气和见识，或材料，或政治倾向而不大关

注理论思维，更少关注严密的学术论证。^{〔1〕}

回头看来，甚至这一时期具有极大政治社会意义的思想解放在某些社科甚或人文学界也给学界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并且影响久远。例如，作者和读者往往以问题的政治、社会意义替代问题的学术意义，很少纯智识的考量，也不大关注培养学生的智识爱好，乃至许多本来颇有学术潜质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是以关注社会政治情势和解放思想为要点，这培养了一种以社会热点争论为导向的“学术”，甚至潜心于开发社会热点、引发社会轰动，误以为引发社会轰动就是智识和学术贡献，“著名”就是“顶尖”。这种风格和路径不仅塑造了这一代学人最初的“研究”风格，而且路径依赖，一直影响到今天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

这就意味着，缺乏坚实的以智识为导向的学术传统并不意味着没有学术传统，就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中，已经形成了对80学人以及后辈学人颇有影响的传统：对社会热点的关心，对社会轰动的追求，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立场或姿态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一种自觉坚持的政治正确，各种形式的自我实践的学术审查也因此出现了，纯智识性爱好相对被忽视。不断地讨论并亮出自己的“主义”和立场，坚持所谓“敢讲话”的社会姿态，在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上有意迎合或有意抗拒特定受众，力求扮演有良心的公众知识分子，从儒家传统到自由主义，从保守主义到新“左派”，从民粹主义到神秘主义，许多学者总是更看重主义、学派和立场，而不是问题本身，更重视预期听众的感受，而不是重视自己的智识分析的贴切和透彻。这种倾向在这一代学人身上非常明显。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尽管如今整个社会的自由度增加了，但学者以各种形式的自我审查其实更普遍了，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无论这种自我审查是以规避还

〔1〕 这方面的证据很多。梁治平在一篇文章中对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情况——曾在该校78—79级毕业生的回忆中一再赞美——的概括回忆是16个字：“教材老化，课程无味，师资欠缺，资料匮乏”。梁治平：“我的大学”，《我的大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